

两周青铜器铭文“丁亥”析论

岳冠林 张淑一

摘要：从西周到春秋，“丁亥”一词逐渐由记录时间的实际用历转变为吉语，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在青铜器由铭记重大事件的宗家重器转变为大众器物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忽略了干支记载时间的作用，而转为追求它的吉祥如意，代表强盛、壮大的“丁”与代表收获、丰收的“亥”组合成的“丁亥”，成为繁荣昌盛的代名词和周人的偏好。

关键词：两周；丁亥；四分历；月相；吉日

中图分类号：G256；K8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21)02-0063-08

“丁亥”是先秦青铜器铭文中最常见的干支，王国维在《齐国差簠跋》中就提到：“古人铸器多用丁亥，诸钟铭皆其证也。”^①有学者曾统计出182个商周时期有干支纪日的铭文，结果表明“‘丁亥’之用，自西周以迄东周，出现于铭文之次数最多，且至东周之时，有绝对多数之优势。”^②

前人多注意到“丁亥”在干支铭文中的特殊地位，但对此种现象的形成过程进行探讨的文章尚不多。本文拟对两周铜器铭文中的“丁亥”铭文进行历时性考察，分析“丁亥”铭文含义的演变历程，揭示“丁亥”由实际用历转变为吉语的原因。

本文对商周铜器铭文的年代判断主要参考《殷周金文集成》（下简称《集成》）^③《近出殷周金文集录》^④《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⑤《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下简称《铭图》）^⑥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以下简称《铭续》）^⑦，大致分为I商代、II西周早期、III西周中期、IV西周晚期、V春秋时期、VI战国时期。为行文方便起见，文中所引铭文皆用宽式隶定。

一、由铭文纪时句看“丁亥”含义的演变

《殷周金文集成》等金文文献中共收录带干支的铭文1057则，具体情况如下：商代62则，未发现丁亥铭文；西周早期131则，丁亥铭文10则；西周中期256则，丁亥铭文51则；西周晚期242则，丁亥铭文53则。春秋时期306则，丁亥铭文189则；战国时期60则，丁亥铭文20则。（详见附表）

① 王国维《齐国差簠跋》，《观堂集林》卷18，中华书局，1959年，第897页。

② 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龙门书店，1978年，第69页。

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

④ 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

⑤ 钟柏生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2006年。

⑥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⑦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收稿日期：2020-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战国楚简姓氏人名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5BZS036）。

作者简介：岳冠林（1989-），河南商丘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先秦文献。

张淑一（197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先秦文献。

由以上统计可知,从西周到春秋,“丁亥”这一干支的使用占比从0.07%扩大到了61%,数量发生了巨变:自西周中期起,“丁亥”便占据了干支铭文的多数,至春秋时期则达到顶峰,至战国时期又有所回落。那么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在数量变化的情况下,其内涵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以下将从铭文纪时语句的语法方面探究这一问题。

金文中与纪时句有关的动词和介词主要是“在”和“唯”,从它们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可以看出不同时期铭文的语言特点及时间观念。

从“在”和“唯”字两种纪时句式的消长看,金文中记录时间的句式大致分为三种,分别是“在+时间”“唯+时间”,以及“在”“唯”两者同时出现的“唯+时间、在+时间”。其中含有“在”字的纪时句又包括“在+月份”“在+干支”“在+月份+干支”三种,如:

《甯菴鼎》:庚午,王令寢农省北田四品,在二月。(《集成》2710)

《伯矩鬲》:在戊辰,燕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集成》689)

《麦方彝》:在八月乙亥,辟邢侯光昏正吏。(《集成》9893)

而含有“唯”字的纪时句又包括“唯+王年”“唯+月相+干支”“唯+王年+月份+月相+干支”等形式,如:

《小臣觶尊》:丁巳,王省夔且,王赐小臣觶夔贝,唯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又五,彤日。(《集成》5990)

《柞钟》:唯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大师右柞。(《集成》133)

《邳伯鬯》:唯正月初吉丁亥,邳伯夏子自作尊彝。(《集成》10007)

虽然单独看上述“在”字纪时句和“唯”字纪时句并无不同,但在两者同时出现的“唯+时间,在+时间”的纪时句中,“在”字后面所连接的时间名词却都无一例外地从属于“唯”字后面的时间名词,也即“在”字后面所连接的时间更为具体,如:

《四祀卣其卣》:在四月,佳王四祀,翌日。(《集成》5413)

《何尊》:在四月丙戌,……唯王五祀。(《集成》6014)

《耳尊》:佳二月初吉,辰在辛卯。(《集成》6007)

西周中后期以后,含有“在”字的纪时铭文开始减少,到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消失。《说文》:“唯,诺也”,“在,存也”,虽然《说文》将两者都作为实词,但是在金文中,“唯”一般作介词引导时间状语,而“在”则是作谓语动词。从词性来看,“在”字具有较强的实词意义,其作用是强调后接的时间词语的实录性,由此可见,“在”字之后的干支更贴近实际用历。

并且,“在”字后面所连接的干支分布也比较均匀,并没有某一干支占多数的情况。而在由“唯”字引导的纪时句中,以“唯+月份+月相+干支”的形式最多,这一句式产生于西周早期,发展于西周中期和晚期,到春秋时期达到鼎盛,^①其中在春秋时期的“唯+月份+月相+干支”纪时句中,“唯+月份+初吉+丁亥”这一组合方式又占了绝大多数,这一剧变不禁令人怀疑“唯某月初吉丁亥”用历的真实性。

容庚曾指出,从春秋时期开始,铭文中的纪时元素逐渐由史书性质转化为装饰成分。^②从“唯”字句的兴起和“在”字句的衰落来看,这一时间线正好符合铜器铭文史书意义消失和装饰意义增强的趋势。也就是说,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日益发展,青铜器逐渐由宗家重器转变为日常生活器皿,铜器铭文中的纪时元素所承载的记录时间的作用亦逐步减弱,转而成为增加器物内涵的一种方式。“在”字纪时铭文所对应的,是精确记录日期的传统;而“唯”字纪时铭文所对应的,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增多的“唯某月初吉丁亥”的句式,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装饰意义。

二、由月相与干支搭配看“丁亥”含义的演变

依照“月相定点”说,月相定于一日,其中月朔称“初吉”“既死霸”,月望称“既望”“既生霸”,

① 范常喜《金文“唯”字纪时句断代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7辑,第177页。

② 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华书局,2012年,第19页。

其他月相如旁死霸、载生霸(朏)、旁生霸、既旁生霸等,皆是基于朔、望的称呼派生而来。^①统计《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等所收月相铭文可知,“既生霸”这一月相在西周早期出现了10次,西周中期出现了61次,西周晚期出现了52次,春秋时期出现了1次,其发展趋势大致为:肇始于西周早期,盛行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趋于消失。“既望”“既死霸”两个月相的变化趋势与“既生霸”相同,只是数量上略少。在月相与干支搭配方面,“既生霸”“既死霸”“既望”三个月相所连接的干支分布比较均匀,并没有某一干支处于绝对多数的情况。

“初吉”这一月相在西周早期与上述三者类似,仅出现十数次,其所连接的干支分布也同样是均衡的。然而到了西周中期之后,“初吉”的出现次数骤增至157次之多,其中有37次是“初吉丁亥”;西周晚期出现130次,33次为“初吉丁亥”;春秋时期更是达到了279次,186次为“初吉丁亥”;战国时期尚有14次,7次为“初吉丁亥”。

有学者认为金文“初吉”与其他月相比较起来,具有如此多的数量,且行使时间从周初到战国,而其他三者则主要限于西周,因此两者应当不是一类事物。^②还有学者认为“‘初吉’在西周时期是月相四分法的一个名称,至春秋后乃演变为仅仅表示吉利意义的一种套话。”^③虽然后者提到的“月相四分”说尚存争议,但“初吉”在春秋时期演变为吉语的这一提法,却对我们不无启发。从对传世典籍的梳理来看,初吉表示月朔是可信的,^④至于为何会造成“初吉”大大多于其他月相,原因应与“丁亥”一词演变为吉语有关。下面我们从历法推算的角度,对丁亥一词演变为吉语的过程进行分析。

最初,丁亥为该日的实指。从具体的铜器铭文可知,“丁亥”在西周时期多为实际用历。如:

《师颍簋》:“唯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集成》04312)

该铭文符合周孝王元年历谱。周孝王元年为公元前928年,入殷历丙子部第32年,该年子正丁未朔,闰六月,故九月癸酉朔,当月十五日正为丁亥。^⑤

《散伯车父鼎》:“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集成》02697)

《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集成》04126)

① 目前学术界关于月相的解释大致分为“月相四分”和“月相定点”两种,以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影响最大,王氏在《生霸死霸考》中主张每月的初一至初七、初八为初吉,初八、初九至十四、十五日为既生霸,十五、十六日至二十二、二十三日为既望,二十三日至晦为既死霸。然而在具体的历日研究中,虽然“四分说”可以解释较多的金文月相问题,但其中也存在每个月相所涵盖的范围过于宽泛的因素,如此也造成了它的含混性。由此俞樾的“定点说”亦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王国维提出“月相四分说”之前,俞樾便在《生霸死霸考》一文中提到“朔为死霸之极,望为生霸之极。……一日既死霸,二日旁死霸,三日载生霸,亦谓之朏;十五日既生霸,十六日旁生霸,十七日既旁生霸。”董作宾就赞同“月相定点”,董氏在《周金文中生霸死霸考》里认为“初吉”是朔,指每月的初一日。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二)》中同意王氏“初吉”为月相的看方法,又以“定点说”为补充,认为“初吉”即朏,值每月初三日。今人张闻玉在《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中也指出:“月相非定点不可,不定点,月相的记录就毫无价值。”本文对月相与干支的研究即基于“月相定点”说。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第19页;俞樾《春在堂全书》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86页;董作宾《董作宾学术论著》下,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第989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1954年第10期,第69页;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② 刘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年第11期,第76-84页。

③ 王和《“初吉”简论》,《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第1页。

④ 《诗经·小雅·小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毛《传》:“芄野,远荒之地。初吉,朔日也。”《国语·周语上》“自今至于初吉”,韦昭注:“初吉,二月朔日也。”《周礼·天官》“正月之吉”,郑玄注:“吉谓朔日。”清人夏炘在《学礼管释》中总结到:《周礼·大宰》《大司徒》《乡大夫》《州长》《大司马》《大司寇》《布宪》,皆言“正月之吉”,郑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师》“月吉”,郑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诗·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论语》“吉月”,孔安国亦以月朔解之,此自来相传之古训也。“吉”训善,不训始,然亦有始义。《尔雅》“元,始也。”元又训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贾逵《左传·文公十八年》注:“元,善也。”元训始,亦训善,则“吉”训善,亦可训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从以上记载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传世文献,应当说,传统对于初吉的解说是难以否定的。初吉虽不由月相得名,但有表月相纪日之实。因为朔日为一月之始,古人重视“告朔”之礼,以朔日为吉日,望日亦为吉日。故“初吉”实指朔日,即月初一。

⑤ 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2页。

有观点认为以上两器是孝王四年器，^①周孝王四年为公元前 925 年，该年子正庚申朔，八月正为丁亥朔。^②

《大簋盖》：“唯十又二年二月既生霸丁亥。”（《集成》04298）

杨宽认为该器属于夷王时期，^③陆星原认为属于厉王时期。^④从历日推演来看，该铭文符合周孝王十二年，即公元前 917 年，该年子正甲辰朔，二月为癸卯朔，二月十五日正为丁亥。^⑤

《虢季子白盘》：“佳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集成》10173）

此铭文所记为宣王十二年，^⑥校比公元前 816 年宣王十二年天象，子正，正月朔日正为丁亥（定朔戊子 03h49m，合朔在后半夜，失朔不到四小时）。^⑦

由于西周时期王年、月份、月相以及干支四项俱全的丁亥日铭文较少，以上诸器仅作为“丁亥”为实指现象的代表，但可以看出“丁亥”在西周铭文中一般作为实际用历。

而其后，开始出现以其他亥日作为“丁亥”的情况。如西周时期的《元年师兑簋》铭文作“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集成》04274），《三年师兑簋》铭文作“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集成》04319），但排比历日得知，从元年五月朔（即初吉）到三年二月朔，其间经 9 个月、12 个大月共 21 个月，计 621 日。干支每 60 日一轮，余 21 日。甲寅去乙亥正好 21 日，而甲寅去丁亥为 33 日，《三年师兑簋》中的“丁亥”实为“乙亥”。

又《作册吴方彝盖》铭文作：“佳二月初吉丁亥。……佳王二祀”（《集成》09898），夏含夷以“月相四分说”释读此铭文，认为属于懿王二年。^⑧以“月相定点”的原则来考察，此器当属于穆王二年，与穆王二年二月乙亥朔（定朔甲戌 16h57m）相合，亦属以乙亥日为丁亥。^⑨

又《师虢簋》铭文作“唯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集成》04325），该铭文符合周孝王十一年历谱。周孝王十一年为公元前 918 年，该年九月丙子日 15h56m 合朔，实际用历记录当为乙亥，此铭文仍是以乙亥为丁亥。^⑩

如果说西周时期以其他亥日为“丁亥”在干支上尚有些许关联，到春秋以后，则干脆出现了以非亥日为“丁亥”的情形。如春秋早期的《楚王颀钟》铭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颀自作铃钟，其聿其言。”（《集成》00053），铭文中的“楚王颀”就是楚王熊麇，^⑪据《史记·楚世家》：“（文王）十三年卒，子熊麇立，是为庄敖”。^⑫

楚王熊麇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676 至公元前 671 年。公元前 676 年为殷历癸酉蓂第 56 年，癸酉蓂的蓂余为 9，第 56 年前大余 40，前小余 920。由于殷历与实际天象每年有 3.06 分的误差，加上误差之后得到熊麇在位期间子、丑、寅月的月朔如下：公元前 676 年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公元前 675 年子月戊申朔、丑月戊寅朔、寅月丁未朔；公元前 674 年子月癸酉朔、丑月癸卯朔、寅月壬申朔；公元前 673 年子月丁卯朔、丑月丙申朔、寅月丙寅朔；公元前 672 年子月辛酉朔、丑月辛卯朔、寅月庚申朔；公元前 671 年子月乙酉朔、丑月乙卯朔、寅月甲申朔。^⑬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第 32 页。

② 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第 354 页。

③ 杨宽《西周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29 页。

④ 陆星原《卜辞月相与商代王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年，第 154 页。

⑤ 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第 358 页。

⑥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第 34 页。

⑦ 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第 409 页。

⑧ 夏含夷《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6 月，第 229 页。

⑨ 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第 314 页。

⑩ 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第 357 页。

⑪ 何琳仪《楚王颀钟器主新探》，《东南文化》，1999 年，第 3 期，第 93-95 页。

⑫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048 页。

⑬ 使用殷历在消除误差后所得的月朔与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所列月朔大致相同，个别月朔干支虽不同但实际合朔时间相差不到半日。无论是以殷历推算还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测算的朔日干支，楚王熊麇在位期间皆未发现正月丁亥或者亥日干支为朔日。数据参考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 年，第 70 页。

由上可知，楚王熊麇在位期间无论是子正、丑正还是寅正，都没有正月为丁亥朔或亥日朔，因此《楚王额钟》的铭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只能是把非亥日算作了“丁亥”。

春秋中期的伯游父诸器也存在类似的状况，铭文如下：

《伯游父卣》：唯正月口(初)吉口(丁)亥，黄季之白游父乍其旅卣，其眉寿无疆，永宝是尚；（《铭图》19239）

《伯游父罍》：唯五月初吉丁亥，黄季氏白马颈君游父乍其尊，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铭图》14009）

《伯游父壶》：唯六月初吉丁亥，马颈君白游父乍其旅壶，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铭图》12412）

《伯游父盘》：唯六月初吉丁亥，马颈君白游父乍其沫盘，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铭图》14510）

上述诸器属于春秋中期的黄国器，器主是黄国季氏家族封邑在马颈的伯游父。^①铭文中提到“正月初吉丁亥”、“五月初吉丁亥”、“六月初吉丁亥”三个历日，四分历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并以“十九年七闰”的原则调配回归年与朔望月之间的大致平衡。按照月相定点原则来推算月朔的六十个干支，大致每年只有一个月朔为亥日，每五年才会出现一次月朔为丁亥日。而就作器常识以及当时黄国的冶铸水平来说，^②上述诸器应无可能每隔五年才铸造一个，因此伯游父诸器铭文正月、五月、六月朔日皆为“丁亥”甚至亥日的可能性都很小，极可能存在把非亥日也写成“丁亥”的情况。

又战国时期的《越王者旨于暘钟》，其铭文作：“唯正月仲春，吉日丁亥，越王者旨于暘择昏吉金。”（《集成》00144），铭文中的“越王者旨于暘”，即越王勾践之子颀与。^③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卒，子王颀与立。王颀与卒，子王不寿立”。^④

颀与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64至公元前459年。公元前464年为殷历庚午部第40年，庚午部的部余为6，第40年前大余13，前小余818，去除误差之后得到颀与在位期间子、丑、寅月的月朔如下：公元前464年子月癸未朔、丑月癸丑朔、寅月壬午朔；公元前463年子月戊寅朔、丑月丁未朔、寅月丁丑朔；公元前462年子月壬寅朔、丑月辛未朔、寅月辛丑朔；公元前461年子月丙申朔、丑月丙寅朔、寅月乙未朔；公元前460年子月庚寅朔、丑月庚申朔、寅月己丑朔。公元前459年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⑤越王颀与在位期间亦无正月丁亥朔或亥日朔，因而《越王者旨于暘钟》铭文也存在把非亥日作为“丁亥”的情况。

由上述历日推算可见，春秋以后的“丁亥”铭文有很多非实指的情形，那么这时的“丁亥”很可能已失去了记录日期的意义，只是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而存在。春秋晚期《媿盘》铭文：“佳曾八月，吉日佳亥”（《铭续》0948），又有战国早期《昭王之卣》铭文：“佳正孟蓍，吉日佳庚”（《铭续》0909），以上两器铭文不以明确的干支而仅以亥日和庚日来记录时间，说明在青铜器由铭记家族或个人重大事件的宗家重器到成为大众器皿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忽略了干支记载时间的作用，而转为追求它的吉祥寓意，^⑥“丁亥”作为人们偏好的一种，实现了由干支到吉语的逐步演变。

三、“丁亥”偏好的原因

① 周亚《伯游父诸器刍议》，《上海博物馆集刊》，2005年，第114-129页。

② 黄国于公元前648年为楚所灭，在黄国故城考古发现12处青铜冶铸作坊，范围较大的占9处。范围较大的冶铸处，礼器和兵器残片甚多，而范围较小的3处冶铸作坊中，生活用具残片较多，由此可见当时的青铜器已较为普及。参见杨履选《春秋黄国故城》，《中原文物》1986年01期，第54-57页。

③ 李家浩《“越王者旨于暘”新考》，《历史语言学研究》2014年01期，第140-148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2108页。

⑤ 使用殷历在消除误差后所得的越王颀与在位期间子丑寅三个月朔与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所列月朔大致相同，个别月朔干支虽不同但实际合朔时间相差不到半日。数据参考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第173页。

⑥ 白川静在《金文通释》中统计的铜器铭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干支为“丁亥”“庚寅”“庚午”，屈原在《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见庚日是仅次于亥日的另一个吉日。参见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七》，白鹤美术馆，1978年，第316页。

周人对于“丁亥”日的偏好，在传世文献中也有显现：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郑玄注：“元辰，郊后吉亥也。”^①

《仪礼·少牢馈食礼》：“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②

《大戴礼记·夏小正》：“丁亥，万用入学。”^③

《大戴礼记·夏小正》自注：“丁亥者，吉日也。”

对于如此频繁出现的“丁亥”，郑玄也意识到未必是实指，而是出自对亥日的喜好，其《仪礼·少牢馈食礼》注引《禘于太庙礼》谓：“丁未必亥也，直举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庙礼》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亦用之，无则苟有亥焉可也。’”即人们以丁亥日为最大的吉日，在没有丁亥日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己亥、辛亥代替，甚或哪个亥日都行。

那么当时人为何以“丁亥”为吉日的代名词呢？关于“丁”，庞朴先生认为《周易》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与“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之辞，后甲先庚皆得丁日，丁日之被特别重视，可能与此有关。^④庞先生说虽有据，但仍未点出“丁”日被看重的根本。“丁”的本义为“壮”，《说文》：“丁，夏时万物皆丁实，象形”，^⑤段玉裁注：“丁实，小徐本作丁壮成实。”^⑥古人认为由甲至癸的十天干，代表了事物从初生到壮大再到收敛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丁所代表的正是事物如日中天的最强盛状态，如：

《史记·律书》：“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⑦

《汉书·律历志》：“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楙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⑧

《白虎通·五行》：“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强也。”^⑨

关于“亥”，《史记·律书》：“亥者，该也”，^⑩《淮南子·天文训》：“亥者，阂也。”^⑪“亥”“该”“阂”三者音近通假，“阂”为本字，所以《史记·律书》司马贞《索隐》引《后汉书·律历志》谓“该阂于亥”，张守节《正义》亦引孟康云：“阂，藏塞也。阴杂阳气藏塞，为万物作种也。”“阂”有收贮之义，又引申为盖藏米谷钱粮各种收获物的仓廩，因而唐孔颖达《礼记·月令》疏谓：“知用亥者，以《阴阳式法》‘正月亥为天仓’，以其耕事，故用天仓也。”^⑫仓廩代表收获、丰收，因而“亥”也就具有了繁盛的意蕴。代表强盛、壮大的“丁”与代表收获、丰收的“亥”组合成的“丁亥”，自然成了繁荣昌盛的代名词，成为农业社会人们喜好的、寄望人丁兴旺谷物丰收的吉祥语便顺理成章。从西周到春秋，随着青铜器由普通人少有机会铸造的铭刻庄严史事的“宝尊彝”变成较为普遍的器物，“丁亥”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铭文当中，成为了与器物的纹饰类似的带有美好喻意的装饰语。

综上，从西周到春秋，“丁亥”一词逐渐由记录时间的实际用历转变为吉语。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在青铜器由铭记重大事件的宗家重器转变为大众器皿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忽略了干支记载时间的作用，而转为追求它的吉祥寓意，“丁亥”的独特内涵使其成为了繁荣昌盛的代名词。

①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415页。

②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 附校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55页。

③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④ 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第84页。

⑤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308页。

⑥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49页。

⑦ [汉]司马迁《史记》，第1486页。

⑧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964页。

⑨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1994年，第177页。

⑩ [汉]司马迁《史记》，第1244页。

⑪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0年，第112页。

⑫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416页。

附：金文六十干支使用频次表^①

序号	干支	I 商	II 西周早期	III 西周中期	IV 西周晚期	V 春秋	VI 战国
0	甲子	1	3	0	1	0	0
1	乙丑	0	3	2	0	2	0
2	丙寅	3	0	2	1	0	0
3	丁卯	1	3	15	0	0	0
4	戊辰	1	3	3	0	0	2
5	己巳	0	0	0	1	0	0
6	庚午	1	3	9	17	30	2
7	辛未	0	2	6	0	0	1
8	壬申	1	1	4	3	8	0
9	癸酉	0	0	1	0	0	0
10	甲戌	0	0	12	21	1	0
11	乙亥	6	12	8	2	16	8
12	丙子	0	0	0	0	0	0
13	丁丑	0	6	12	0	0	0
14	戊寅	1	0	11	3	2	2
15	己卯	0	1	1	0	0	0
16	庚辰	0	0	2	0	0	0
17	辛巳	4	2	2	1	2	0
18	壬午	0	0	4	6	10	1
19	癸未	1	4	0	1	2	1
20	甲申	0	10	4	3	0	0
21	乙酉	1	4	2	0	1	1
22	丙戌	0	1	0	2	0	0
23	丁亥	0	10	51	53	189	20
24	戊子	0	5	0	0	0	0
25	己丑	0	4	6	1	2	6
26	庚寅	3	4	20	29	0	3
27	辛卯	6	4	1	5	0	0
28	壬辰	0	1	0	2	0	0
29	癸巳	2	0	6	0	0	1
30	甲午	0	6	10	5	0	0
31	乙未	4	2	1	0	0	0
32	丙申	3	0	1	1	0	0
33	丁酉	0	0	3	1	2	0
34	戊戌	0	1	7	0	0	0
35	己亥	3	3	2	1	2	1
36	庚子	0	0	0	0	0	0
37	辛丑	1	0	2	0	0	0

① 表中干支引自《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同一铭文在不同文献中重复出现者不作重复统计。

38	壬寅	0	1	7	8	0	0
39	癸卯	0	2	0	2	0	0
40	甲辰	0	0	0	0	0	0
41	乙巳	2	0	2	2	1	0
42	丙午	2	1	3	0	1	2
43	丁未	2	1	0	0	2	0
44	戊申	0	1	4	2	9	0
45	己酉	2	1	0	0	1	2
46	庚戌	0	0	1	7	0	0
47	辛亥	1	3	2	0	7	0
48	壬子	0	0	0	0	0	0
49	癸丑	0	0	2	0	0	0
50	甲寅	3	0	6	19	0	0
51	乙卯	0	6	8	17	0	0
52	丙辰	1	0	0	0	0	1
53	丁巳	3	2	2	15	2	0
54	戊午	0	0	2	1	0	1
55	己未	0	0	1	0	1	0
56	庚申	1	6	3	4	12	3
57	辛酉	1	8	1	1	0	0
58	壬戌	0	0	2	4	0	0
59	癸亥	1	1	0	0	1	2
总计		62	131	256	242	306	60

(本文造字感谢中国美术学院段凯博士)

(责任编辑:李路)

(上接第 23 页)这 20 条中的大多数都属首次提出,比如第 3 条和第 13 条属首次校出文字讹误,第 34 条和第 36 条属于《国语》流传过程中新版本产生的文字讹误,第 33 条是根据韦昭注释通例理校所发现的文字问题,第 2 条、第 6 条、第 21 条、第 25 条则是通过上下文语境分析得出的合理训释,这些都是此前《国语》研究者尚未关注而为太宰纯首次揭出者。因此太宰纯的某些注说条目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责任编辑:刘兵)